

不可湮沒的一代高僧*

——北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

南京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祁海寧

提要

演化大師可政是北宋真宗時期一位非常活躍和重要的僧人。他一生主持或參與修建了四座塔；保存了佛頂真骨、玄奘頂骨等多份極為重要的舍利聖物；他主持重建的北宋長干寺，上繼六朝長干寺之佛脈，下啓明代大報恩寺之輝煌。可政的一生，為中國和世界佛教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過去由於史料的不足，對可政的研究近於空白。二〇〇八年，北宋長干寺地宮得到考古發掘，出土了許多前所未見的新史料，為深入研究可政提供了契機。本文將考古新發現的材料與文獻史料相結合，全面梳理可政一生的事蹟，並對有關問題進行考證，使這位湮沒已久的北宋高僧第一次得到較為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可政 演化大師 北宋 長干寺 舍利 宋真宗

目次

- 一、 引言
- 二、 可政個人與家族的相關情況
- 三、 可政一生的主要事蹟
 - (一)、玄奘頂骨舍利與白塔
 - (二)、大明寺普惠塔
 - (三)、塔就蒲津
 - (四)、長干寺、塔的重建
 - (五)、義井與白塔
- 四、 另一位可政——金陵蔣山可政禪師
- 附錄：〈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碑文

* 收稿 2012/2/1，通過審查。2012/3/26

一、引言

二〇〇八年，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城南古長干里成功發掘的北宋長干寺真身塔（又稱天禧寺聖感塔）地宮，是新世紀以來中國收穫的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經過近千年的歷史滄桑，這座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佛塔地宮極為幸運地未遭盜擾。從深達 6.74 米的地宮之中，出土了「佛頂真骨」、「感應舍利」、「諸聖舍利」等多份舍利聖物。其中，以金棺、銀槨精心瘞藏的一枚「佛頂真骨」，形如蜂窠，色澤黃白，髮孔分明，其各方面特徵皆與佛典中記載的佛頂骨舍利相當一致。¹（圖一）長干寺佛頂骨舍利的出土，使得中國同時擁有了佛頂骨、佛指骨（陝西法門寺）和佛牙（北京靈光寺）三大佛舍利，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佛教界的地位，在海內外佛學界、考古界和史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

除舍利之外，長干寺地宮還出土了大量極為珍貴的宋代佛教文物，其中包括來自古印度、保存完好的梵文貝葉佛經；以七寶阿育王塔為代表的一整套材質多樣、工藝精湛的舍利寶函；百餘幅質地上乘、種類豐富、裝飾精美的絲織品；檀、沉、乳、豆蔻、丁香等香料實物，以及香囊、香爐、香袋、香匙、淨瓶等成套香具。經初步統計，地宮中出土的各類供養器物多達 12000 餘件，成為繼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宮之後，又一座舉世矚目的佛門寶庫。²

¹ 關於長干寺佛頂骨舍利的考證，可參見趙德興、楊永泉、華國榮，〈金陵長干寺佛頂骨舍利歷史傳承〉，《金陵佛教》2010年特刊。

² 關於長干寺地宮考古發掘的基本情況，請參見南京市博物館大報恩寺遺址考古隊，〈2007—2010：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北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穫〉，《中

國文物報》2010年12月8日，第6、7版。

這座寶庫的締造者就是北宋高僧演化大師可政。在地宮出土的舍利石函上，鐫刻著題為〈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以下簡稱〈石函記〉）的長篇銘文，詳細介紹了大中祥符年間，可政得到宋真宗支持，與將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共為「導首」，率領眾緣，於六朝舊址重建長干寺，新建高達二百尺的九級磚塔，在塔下瘞藏「感應舍利十顆，並佛頂真骨，洎諸聖舍利」這一重要歷史事件。（圖二，碑文全文附後）在銘文中，可政被稱為「導首」和「塔主」，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建寺、建塔過程中發揮的核心作用。可政這個名字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考古發掘的成果之中。一九四二年，日軍侵華佔領南京期間，曾在距離長干寺地宮不足四百米的地方發現了明代大報恩寺三藏塔地宮，從中出土了我國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師的頂骨舍利。在瘞藏舍利的石函上，同樣清晰地鐫刻著「長干演化大師可政」的名號——因為正是可政於端拱元年（988年）從長安紫閣寺傳得這枚玄奘頂骨舍利，千里迢迢請回金陵，並於天聖五年（1027年）在長干寺建白塔供奉。³

佛頂骨舍利與玄奘頂骨舍利均為意義重大，具有世界影響的佛門至寶，它們能夠留存至今皆與可政付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僅此一點，如何評價可政對於中國、乃至世界佛教發展所做的貢獻均不為過，他是一位值得後人永遠銘記的真正的高僧大德。但是，傳統文獻史料關於可政的記載非常稀少。出現這種狀況，一方面是由於各種原因所導致的史傳失載：比如贊

³ 關於三藏塔地宮的發掘情況，請參見日人谷田闕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玄奘大師研究（下）》，頁347-360，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

寧的《宋高僧傳》，完成於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其時可政雖然已獲玄奘頂骨舍利，但尚未為之建塔供奉，功業遠未成就，不入贊寧法眼亦在情理之中。而其後存世的僧史，如《大明高僧傳》、《補續高僧傳》等，雖均有意與《宋高僧傳》銜接，可惜皆編撰於明末，年代相隔既遠，史料又遠非溥洽，導致兩宋時期許多重要僧人無傳。《補續高僧傳》雖然在〈永公傳〉中提及可政復建長干寺之事，然而內容完全引自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未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⁴此外，由於可政屬律宗，以天臺宗為中心的《佛祖統紀》未收錄其事蹟。而以禪師為主角的各種燈錄，雖然記載了「金陵蔣山可政禪師」，⁵但與本文討論的演化大師可政並非同一個人。另一方面，有關可政的史料散佚情況非常嚴重：南宋祝穆的《方輿勝覽》記有「長干塔」條，其下未寫說明文字，只是注曰「事見《僧史》」，表明當時已有一部《僧史》詳細介紹了長干塔的情況，因此祝穆將其從略。⁶既曰《僧史》，自然以記錄僧人為主，塔主可政應是書中敘述的重點，可惜該書未能留存至今。另外，長干寺聖感塔、白塔建成之後，按照當時的慣例皆延請名師撰寫〈塔記〉，並勒石立碑。⁷元代文宗時期，天禧寺和聖感塔大修，完工之後

⁴ 明·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二，《卍新纂續藏經》冊 77，頁 510。

⁵ 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目錄，《卍新纂續藏經》冊 78，頁 630；明·居頂，《續傳燈錄》卷十二，《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51，頁 545。

⁶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四，頁 246，中華書局《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2003年。

⁷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天禧寺」條記載：「寺有阿育王塔，天禧中賜名『聖感』，有〈塔記〉，題詠尤多」，頁 1121，南京出版社《南

亦請御史中丞趙世延撰寫記文，立「修天禧寺碑」。⁸然而這些碑刻今既不存，文字亦未能傳世，空見存目，殊為可惜。就本人所知，目前僅在《景定建康志》、《嘉靖惟揚志》等方志，以及夏竦《文莊集》、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王銍《默記》等文集中，保存了一些與可政相關的記載，一鱗半爪，堪稱吉光片羽。上述狀況致使可政在三藏塔發掘之前很少為人注意，其人其事近乎湮沒。

北宋長干寺地宮的發掘，不僅出土了內容豐富的〈石函記〉，而且發現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字材料。比如在七寶阿育王塔、銀槲等器物上發現了多條鑿刻銘文，其中僅七寶阿育王塔之上的銘文就多達 20 條、300 餘字；而出土的百餘幅絲織品中，約有 20 餘幅帶有當年長干寺各位主事和施主題寫的墨書銘文，其中就包括可政的親筆題記。這些新發現的考古材料從多個方面透露出可政的相關訊息，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以往史料的不足。通過這批材料，我們得知可政不僅保存了上述兩份極為珍貴的舍利，而且一生之中至少修建了四座塔。他師出名門，交遊廣泛，融通練達，更與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建立了特殊的關係。這些都是以往不可能獲得的新認識。

作為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和長干寺地宮考古發掘的主持者，本人對於可政大師的遺澤感受最為真切，深感有責任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高僧。因此不揣淺陋，將考古新發

京稀見文獻叢刊》本，2010年；同書卷三十三記有「天禧寺重修寶塔碑」條目，頁 863；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九十五記有「天禧寺白塔記」條目，《四庫全書》本。

⁸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九十九。

現的材料與原有史料相結合，力求盡可能全面地梳理可政一生的經歷、貢獻與成就。若有可采之處，或可補僧史之缺。

二、可政個人與家族的相關情況

在以往的文獻材料之中，關於演化大師可政的俗家姓氏、籍貫、家族背景、出家與受業經歷等方面的訊息完全是空白，未見任何記載。不過，長干寺地宮中編號為「TN23-6」絲織品的出土，使上述狀況有了較大的改善。

「TN23-6」是在七寶阿育王塔內部發現的一塊正方形羅帕，出土時它被折疊成長條狀，墊置於銀槩之下。與之對應，另有一塊編號為「TN23-2」的長方形羅巾折疊後被放置於銀槩頂部。而銀槩之中藏有金棺，金棺之中即瘞藏「佛頂真骨」舍利。兩塊巾帕上皆有墨書題記——「TN23-2」記錄的是「導首」王文的情況；「TN23-6」記錄的就是可政本人的情況。這兩塊巾帕被放置於最接近佛頂骨舍利之處，無疑是對兩位「導首」在長干寺、塔重建過程中核心作用的承認與體現。兩塊絹巾上的題記應為兩人親自撰寫，真實可信。其中「TN23-6」的墨書題記共 7 行、99 字，現抄錄如下：

建塔主講律臨壇演化大師賜紫可政。先受業和尚金陵昇元寺長講《上生經》、《百法論》大德賜紫玄月。壇中和尚唐左街僧錄演法大師昭謀，羯磨闍梨紹賢，教授闍梨知白，證戒闍梨法□、處安、彥咸、崇節、德明、浩興、道隨。生身父高洪張洪，生身母禹氏十一娘。(圖三)

這份題記字數不多，但是提供的信息量不少。根據它我們

首先得知，大中祥符年間可政完整的銜稱是「講律臨壇演化大師賜紫」，既有師號、又獲賜紫，除了僧職以外，可政已經得到了一個僧人可以獲得的最高榮譽。而且可政還有資格能夠臨壇講律，是一個有學問的講僧。其次，我們可以得知，可政出生於南唐時期，幼年於金陵昇元寺出家，受業恩師為賜紫高僧玄月。昇元寺位於南京城西南部的鳳凰台，前身即是六朝時期著名的瓦官寺，南唐昇元年間改稱昇元寺，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又改稱為崇勝戒壇寺。⁹昇元寺是南唐、兩宋時期，江南地區非常重要的律宗寺院，該寺設立的戒壇在全國享有很高的地位。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專門下詔給崇勝寺，為戒壇賜名「承天甘露戒壇」，第二年才下詔東京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¹⁰第三，題記中提到的「壇中和尚」、「羯磨闍梨」、「教授闍梨」、「證戒闍梨」等 10 位僧人，是可政受具足戒時的「三師七證」。由於昇元寺本身擁有戒壇，可政應在本寺正式受的戒。為可政授戒的 10 位僧人，皆為當時最有名望的高僧——其主持者「壇中和尚」昭謀，是當時南唐僧職最高的左街僧錄；而其中的德明、崇節，根據《南唐書》的記載，亦是經常出入庭掖，為皇帝講經的高僧。¹¹ 通過這一段題記，我們得知可政

⁹ 參見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四「昇元寺」條，頁 245；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二十一「鳳凰台瓦官寺」條，金山江天寺影印本，民國二十五年。

¹⁰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四，《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49，頁 404。

¹¹ 宋陸遊，《南唐書》本紀卷第三記載，「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南唐書（兩種）》，頁 241，南京出版社《南京稀見文獻叢刊》本，2010 年。

師出名門，受過正規、嚴格的佛學教育，這為其將來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最後，我們得知可政俗姓高，父親名為高洪，¹²母親為禹氏十一娘。在七寶阿育王塔上，我們還找到一條鑿刻銘文：「揚州曾再遇捨銀拾兩打『須大拿王變相』，演化大師可政與母禹十一娘捨錢二貫五百文足，守仁、普倫。」可政與母親共同捨錢參與打造七寶阿育王塔上的「須大拿王變相」，說明大中祥符四年可政生母尚在，也為信佛之人。不過銘文未提及及其父高洪，推測當時他可能已經亡故。

進一步分析，可政在題記中用絕大部分的篇幅介紹自己出家受業、受戒的情況，將受業師和受戒「三師七證」的名字完整記錄，直至最後才用很少的篇幅介紹自己的生身父母，家族的其他成員一概不提。而另一位「導首」王文題記中的內容皆為介紹其家族成員，與此明顯不同。為便於比較，現將「TN23-2」題記的內容亦抄錄如下：

建長干寺舍利塔都勸首、將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並妻史氏十四娘，男凝、男熙、男規、男拯，孫同緣、同會、三哥、四哥、五哥、七哥、八哥、九哥，孫女大娘、二娘、三娘、四娘、五娘、六娘，新婦蔡氏、許氏、楊氏、楊氏，出嫁女王氏一娘子、三娘子、歿故四娘子，亡父二郎，亡妣程氏，繼母陳氏。(圖四)

可政與王文在絹巾上撰寫題記，並放置於最接近佛頂骨舍

¹² 在「TN23-6」題記中，高洪之後寫有「張洪」兩字，似為插入，其含義不能完全確定，推測或為高洪之字。

利的地方，明顯帶有懇請佛祖為題記上記錄之人賜福的心願。將兩塊題記的內容一加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可政最為感激和關心的人，是帶他走進佛門的受業師與受戒師，父母反而排在其次；而王文掛念的完全是其家族成員。兩人雖然皆為信佛弟子，但是僧人與信士之間的區別十分鮮明。可政嚴守出家人之本分，遠離俗緣、尊師樂道、戒行精深的特點也由此得到清晰地體現。另外，可政與王文是長干寺、塔重建的兩大「導首」，但是綜合來看，可政得到皇帝與僧俗各界的支持，全盤統籌，作用最為重要，而王文主要是在經濟上提供支援，因此可政又被稱為「塔主」，而王文又被稱為「都勸首」。但是從兩塊巾帕的擺放位置來看，王文的居上為尊，可政的反而居下為次。本人認為這個細節雖小，却真實地顯示出可政為人謙退，樂意成人之美的大德品行。

「TN23-6」雖然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見的重要訊息，但是無法盡釋我們對於可政的所有疑問。可政的生年、籍貫、家族背景等情況依然是謎。不過「TN23-6」的出土，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文獻材料，激發出新的想法。北宋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六〈浮屠傳〉，記載了一位法名元寂、自號「酒禿」的南唐僧人：

僧元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眾，元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賞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元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

自恣，日以狂飲為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元寂行歌於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群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藉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崗。¹³

這段史料雖然涉及長干寺，但以往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然而「TN23-6」揭示出可政的一些基本訊息之後，這段記載就顯現出特別的意義。本人發現元寂與可政存在諸多的共同之處，因而推測兩人之間可能存在親屬關係。首先，兩人同姓；其次，元寂自稱高駢族人，說明他很可能出生於揚州，而可政雖然在題記中沒有寫明，但是有跡象顯示他的籍貫亦可能是揚州——在後文中我們將重點討論可政一生修建的四座塔，他主持修建的第一座塔「普惠塔」並非位於金陵，而是位於揚州大明寺。萬事開頭難，可政能夠在揚州籌集到巨大的人、財、物力，完成人生第一座塔的建设，說明他可能原籍於此，有較深厚的人脈資源可以利用。元寂與可政第三個共同點是他們都出家於昇元寺。元寂出家於烈祖李昇時期，元宗李璟時期聲名鵲起，得授高職，一度得寵於元宗、後主兩朝。可政的年齡與輩分明顯晚於元寂，如果他確實與元寂有親屬關係，那麼可政離開揚州，來到南唐都城的昇元寺出家，並得到眾多高僧的眷顧就很容易理解，應該離不開元寂的安排與幫助。最後，元寂和可政皆與長干寺結下了不解之緣。元寂因破戒去職，出居長干寺。據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記載，長干寺「至南唐時

¹³ 宋·馬令，《南唐書》卷二十六，《南唐書（兩種）》，頁176，南京出版社《南京稀見文獻叢刊本》，2010年。

為營，廬舍雜比，汗穢蹂踐，無復伽藍緒餘。」¹⁴長干寺是元寂最後的容身之地，其時長干寺空有寺名，實為營舍，破敗不堪。元寂從高峰跌落谷底，一蹶不振，最終醉死於長干寺旁的石子崗。如果元寂與可政有親屬關係，並有提攜之恩，那麼元寂這段慘痛的經歷肯定給可政留下了難以忘卻的記憶，或許成為他日後立誓復興長干寺非常重要的內在驅動力。不過在〈石函記〉中，談及可政復興長干寺的緣由時，只是對比了長干寺歷史上的輝煌與當時的衰敗，以可政「願興墜典」一句輕輕帶過。這難免令人產生疑問，如果元寂確實與可政關係密切，為何可政不在羅帕上的墨書題記和〈石函記〉中提到元寂之名呢？其實這個問題比較容易得到解釋：元寂雖然曾為南唐左街僧錄，顯赫一時，但畢竟因為不守戒律去職，實非僧人之典範；而可政卻是一名嚴守戒律的僧人，因此即便心中感念元寂的親情與恩情，他也不便於宣之於口，更不能著之於文。

上面是本人根據元寂與可政表現出的一些共同點，所做的大膽推測。雖然看起來頗為合情合理，但是缺少關鍵證據的支持，目前只能是一種猜測。要想徹底弄清可政的籍貫、家族背景、以及與元寂的真實關係，仍然有待於今後在史料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三、可政一生的主要事蹟

可政一生高潮迭起，大有作為。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他一生之功績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先後主持或是參與修

¹⁴ 宋·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七，《四庫全書》本。

建了四座塔；二是保護、留存了多份舍利聖物；三是使中斷數百年的長干佛脈得以接續，為明代大報恩寺的輝煌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可政的事蹟在以往的文獻材料中部分有所記載，此次長干寺地宮新出土的材料又給予了關鍵的補充。下面我們按照年代的順序，回顧一下可政走過的極不平凡的一生。

(一)、玄奘頂骨舍利與白塔

可政第一次際遇非常是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記載：

白塔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遍覺玄奘大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呼「白塔」，事俱〈塔記〉。¹⁵

一九四二年，日軍從三藏塔舊址掘出瘞藏玄奘頂骨的石函，在石函上發現銘文：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早因黃巢發塔，今長干寺演化大師可政於長安傳得，於此葬之，天聖丁卯二月五日。同緣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慶，弟子丁洪審，弟子劉文進，弟子張靄。¹⁶

這兩條分別來自文獻和出土實物的材料，證明公元九八八年，可政從長安紫閣寺（位於今陝西省戶縣紫閣峪）得到玄奘

¹⁵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頁1121。

¹⁶ 谷田闕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玄奘大師研究（下）》，頁353—354。

法師的頂骨舍利。可政當時很可能處於遊方的階段，面對命運的垂青，他當機立斷，輾轉千里將玄奘頂骨請至南京供養。不過，當時的可政初出茅廬，無力立即建塔，其後又被其他事耽擱，直至天聖五年（1027年），在唐文遇兄弟、丁洪審、劉文進、張靄等人的幫助下，才最終完成建塔供奉的心願。玄奘頂骨舍利是可政獲得、並保護下來的第一份佛門聖物，但是玄奘舍利塔卻是可政一生所建的四座塔中最後的一座。可政所建的玄奘舍利塔原先位於長干寺之東崗，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為了擴建天禧寺，將該塔遷建至寺院之南崗。¹⁷明成祖朱棣興建大報恩寺時，又在該塔的西部擴建了規模不小的三藏殿建築群，在大報恩寺內形成了一處前殿后塔，相對獨立的區域。明代的玄奘舍利塔被稱為「三藏塔」，其造型為單層覆鉢式。宋代原塔的造型很可能與明代的相同。這種類型的塔由於通體素白，一向被俗稱為「白塔」。

玄奘頂骨舍利經可政東遷金陵，在南京長干里安然渡過了近千年的時光。一九四二年日軍發塔後，玄奘頂骨舍利被多次分供，從此流傳世界各地。目前中國大陸的南京和成都、以及臺灣、日本、印度都珍藏著這枚舍利的一部分，南京等很多地方已經再次為其建塔供奉。¹⁸

¹⁷ 在瘞藏玄奘頂骨舍利的石函上，除了宋代銘文，還有明代加刻的銘文：「奘法師頂骨塔，初在天禧寺之東崗。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薩戒弟子黃福燈，□□□□普寶，遷于寺之南崗三塔之上。是歲丙寅冬十月，傳教比丘守仁謹志。」這段銘文說明了明初該塔的遷建情況。谷田闕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玄奘大師研究（下）》，頁354—355。

¹⁸ 關於玄奘頂骨舍利播遷、分供情況，已有多位學者進行過深入研究。可參

(二)、大明寺普惠塔

可政大器漸成，真正嶄露頭角是在宋真宗景德年間。《嘉靖惟揚志》對此記載道：

宋景德中，僧可政復募民財建塔七級，名曰「多寶」。郡守王化基以聞於朝，賜名「普惠」。¹⁹

清人趙有成撰寫的〈重修棲靈寺並建地藏殿諸天樓碑記〉記載得更為詳細：

景德元年，僧可政募民財，復建七級塔，名曰「多寶」，聞於朝，有泗洲大聖示現。²⁰

大明寺位於揚州市北郊蜀岡中峰之上。該寺歷史悠久，因

見劉大任，〈南京靈谷寺所藏玄奘法師頂骨的來龍去脈〉，黃心川主編《玄奘研究——第二屆銅川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25-131。

¹⁹《嘉靖惟揚志》是目前所知這條記載的最早出處，然而該志全本未能流傳至今，現僅寧波天一閣藏有該志之殘本（上海古籍書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1963年），其中有關上述記載的部分已佚。不過，嘉靖志中的這條記載，清代文獻多次引用，現根據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六（頁373，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本，1960年）和清·趙之璧，《平山堂圖志》卷一（頁57—58，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本，民國七十二年）的記載互校，恢復了《嘉靖惟揚志》記載的這條內容。

²⁰清·趙有成，〈重修棲靈寺並建地藏殿諸天樓碑記〉，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揚州宗教》，頁357，《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出版發行，1999年。

創建於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年）而得名。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該寺建成高達九層的「棲靈塔」，供養文帝所賜的佛舍利。此塔是隋、唐兩代大明寺的象徵，唐代許多著名詩人如李白、劉長卿、高適、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曾登臨賦詩。唐代律宗大師鑒真曾駐錫大明寺，傳戒講律，名聞遐邇，被譽為「江淮之間，獨為化主」。²¹其後鑒真六次東渡，開創了日本佛教律宗，書寫了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唐會昌三年（843年），棲靈塔遭大火焚毀，大明寺也在其後的「會昌法難」中遭到嚴重破壞。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大明寺、塔屢經圯廢，失去了昔日的光彩。²²景德年間（1004—1007年），可政通過民間集資的方式，用四年左右的時間建成了七級「多寶塔」，使大明寺恢復了寶塔參空的勝景，再次振興。多寶塔是可政主持修建的第一座塔，它的順利建成充分證明了可政的才能——他號召力強，在僧、俗信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能夠動員起各方面的力量參與建塔；同時他還善於統籌、協調和管理，才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完成七級寶塔的建設重任。多寶塔建成後，經郡守王化基上報，該塔被朝廷正式賜名為「普惠塔」。這表明可政的才能與事蹟，得到了朝廷上下的關注和肯定。

(三)、塔就蒲津

普惠塔建成後的十餘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和天禧年間，

²¹（日）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大正新脩大藏經》冊2089，頁988。

²²關於大明寺的歷史沿革，可參見揚州市政協文史與學習委員會、揚州大明寺編《大明寺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

是北宋、乃至中國歷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從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開始，北宋朝野上下，由真宗親自主導，以神道設教，先後上演了天書降臨、東封泰山、西祀汾陰、聖祖顯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國各地祥瑞紛呈，大建宮觀。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可政連續建成了兩座塔，並完成了長干寺的重建工程，迎來了人生中最為忙碌、也最為輝煌的一個階段。可政修建第二、第三座塔的情況，〈石函記〉記載道：

聖宋之有天下，封禪禮周，汾陰祀畢，乃有講律演化大師可政，塔就蒲津，願興墜典。言告中貴，以事聞天，尋奉綸言，賜崇寺、塔。同將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共為導首。率彼眾緣，於先現光之地，選彼名匠，載建磚塔，高二百尺，八角九層，又造寺宇。□□進呈感應舍利十顆，並佛頂真骨，洎諸聖舍利。內用金棺，周以銀槲，並七寶造成阿育王塔，以鐵□□函安置。即以大中祥符四年太歲辛亥六月癸卯朔十八日庚申，備禮式，設闔郭大齋，闕於泉際，庶□名數，永鎮坤維。(「□」為殘損無法辨認的銘文)

根據銘文，可政修建的第二座塔位於蒲津(以下暫稱為「蒲津塔」)。蒲津又稱蒲阪津，位於今天山西省永濟市西部的蒲州鎮，宋代屬永興軍路河中府河東縣。蒲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西臨黃河，歷代在此處黃河之上多次修建浮橋，自古為出入關中的要津。唐開元十二年(724年)，在蒲津黃河兩岸「鑄八

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²³這八尊將椿鐵牛，每尊重達 30 餘噸，威猛雄壯，從此成為蒲津的標誌。一九五七年，三門峽水庫蓄洪致使河床淤積，鐵牛被埋入河灘。一九八九年，黃河東岸的四尊鐵牛被重新發掘出土，再次成為蒲津雄風的歷史見證。蒲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它與汾陰比鄰。汾陰為古邑名，因在汾水之南而得名，位於今天山西省萬榮縣境內。宋初汾陰稱為寶鼎縣，與蒲津同屬河中府。真宗親祀汾陰之后，將寶鼎縣升級為慶成軍。汾陰是歷代帝王祭祀后土神祇——女媧的場所。相傳上古時期的黃帝、堯、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都曾在汾陰掃地設壇，祭祀女媧。西漢元狩二年(前 143 年)，漢武帝從祠官寬舒等人之議，「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上」，並親祀后土。²⁴自武帝起，西漢宣帝、成帝、哀帝，東漢光武帝，以及唐玄宗等，皆先後親至汾陰祭祀后土。²⁵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在封禪泰山後不久，拉開了祭祀汾陰的大幕——六月癸丑，知河中府楊舉正上奏，「得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后土」；²⁶七

²³ 宋·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三十九〈地理三〉，頁 100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資料庫」本。

²⁴ 漢·司馬遷，《史記》卷十二〈孝武本紀〉，頁 45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資料庫」本。

²⁵ 關於汾陰后土祠相關情況，可參見清·周景柱，《乾隆蒲州府志》卷四「汾陰后土祠」條，《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冊 66，頁 108，鳳凰出版社等，2005 年；以及楊高雲，〈汾陰后土祠興建原因探究〉，《運城學院學報》2004 年第 4 期。

²⁶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三，冊 6，頁 1673，中華書局，1995 年。

月辛丑，「文武官、將校、耆艾、道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²⁷真宗先是假意不許，表三上之後方才同意。大中祥符四年正月至二月，真宗與群臣奉天書，從開封出發抵達寶鼎，親祀后土。祭祀完成後，真宗又從汾陰抵達蒲津，「度河橋，觀鐵牛」。²⁸

「西祀汾陰」是宋真宗以神道設教系列活動中的重要一環。雖然史書記載此事肇始於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的「狀請」，實際上這項活動很可能與天書降臨、東封泰山一樣，在景德末年就已完成策劃，從大中祥符元年逐次開始實施而已。有意思的是，可政參與「蒲津建塔」的時間與北宋高層籌畫、實施西祀汾陰的時間相當吻合。可政「蒲津建塔」的時間〈石函記〉雖未明確，但是可以大致推定：景德年間可政忙於修建普惠塔，無暇分身，他參與「蒲津塔」的時間應該為大中祥符元年以後；而〈石函記〉明確告訴我們，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可政已在金陵為長干寺地宮的落成和佛頂骨舍利的入藏舉辦「闔郭大齋」。長干寺地宮的修建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因此可政「塔就蒲津」的時間應該為大中祥符三年末，即宋真宗即將開始汾陰之行的前夕。

可政參與修建的這座「蒲津塔」無論是地點的選擇，還是建設週期的安排，皆與宋真宗西祀汾陰的活動絲絲入扣。而且在發動西祀汾陰的過程中，無論是第一步「狀請」，還是第二步「詣闕請」，僧人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因此由僧人出面建成一座塔，作為佛教界支持、歡迎真宗西祀汾陰的實際

²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四，冊6，頁1681。

²⁸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五，冊6，頁1712-1713。

行動，順理成章。更為明顯的證據是，在〈石函記〉中，「封禪禮周，汾陰祀畢」本就與「乃有講律演化大師可政，塔就蒲津」連在一起敘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昭然若揭。因此本人相信，大中祥符初年可政在蒲津建塔，是為宋真宗西祀汾陰活動所服務的，是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當中的組成部分。

可政蒲津建塔之事未見於其他史料，〈石函記〉中也僅有「塔就蒲津」四個字，提供的資訊極為有限。但是該塔既然是為迎接真宗所建，那麼在西祀汾陰的過程中，真宗很可能巡幸此處。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真宗本紀》等史料的記載，西祀汾陰時真宗唯一巡幸的佛寺為河中府開元寺²⁹。此寺正是位於蒲津——據《乾隆蒲州府志》記載，「開元寺在東關薰風巷東」。³⁰另外，在該志中還有一條記載值得關注：

重宣，虞鄉趙氏子。為僧開元寺，堅持戒律，功行動篤。宋真宗時與萊公寇準善，寇公言於上，賜紫衣以旌其德。咸平四年示寂，楊翰林大年為撰〈塔銘〉。³¹

重宣是蒲津開元寺的高僧，與宰相寇準關係深厚，並通過寇準獲知於真宗，得到了賜紫的榮譽。重宣圓寂，開元寺為其

²⁹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五，冊6，頁1713；元·脫脫等，《宋史》卷八〈真宗三〉，頁147-14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資料庫」本。

³⁰ 清·周景柱，《乾隆蒲州府志》卷三，《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冊66，頁94-95。

³¹ 清·周景柱，《乾隆蒲州府志》卷十四，《中國地方誌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冊66，頁302。

建塔，〈塔銘〉由真宗時期另一位重臣翰林學士、知制誥楊億撰寫。重宣及其所在的開元寺與真宗君臣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一斑。而且楊億還是西祀汾陰活動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真宗「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龍圖閣學士杜鎬，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³²毫無疑問，西祀汾陰之時巡幸開元寺是真宗君臣早已確定的行程安排。因此，為迎接真宗所建之塔也最有可能位於該寺之中。至於可政所建的「蒲津塔」是否就是這座「重宣塔」，目前由於史料所限，無法證實，但是本人認為，其可能性是很大的。楊億為重宣所作的〈故河中府開元寺壇長賜紫僧重宣塔記〉，即《乾隆蒲州府志》所稱的〈塔銘〉，收錄在他的《武夷新集》中，保留至今。據該銘記載，重宣「以咸平四年四月庚戌示身有疾，殆至彌留……甲子奉全身闍維於南郭之外，得舍利三十餘粒，以其年某月某日遷靈骨於其原，建浮圖焉。」³³雖然重宣舍利塔開建於咸平四年（1002年），與真宗巡幸時間相隔約8年，但是建塔工程因各種原因久拖不成是相當常見的現象，這或許是有關方面將可政從揚州請至蒲津的一個重要原因。可政作為一名江淮僧人，從揚州遠赴千里之外的蒲津參與建塔，無疑與他修建普惠塔時的傑出表現有關——景德末年可政一舉建成普惠塔，大才畢現，聲望日隆。其時恰逢朝廷籌備「西祀汾陰」大典、急需完成蒲津塔工，因此在高層策劃者眼中，可政成為擔此重任最適合的人選。

³²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四，冊6，頁1683。

³³ 宋·楊億，〈故河中府開元寺壇長賜紫僧重宣塔記〉，《武夷新集》卷六，《四庫全書》本。

另外本人推測，可政參與蒲津建塔，還可能與其早年遊方西部的經歷有關。太宗年間可政深入關中，獲取玄奘頂骨舍利，很可能取道於蒲津，因為蒲津正是出入關中的要道。開元寺作為蒲津大寺，又是律宗寺院，³⁴身為律師的可政遊方至此很可能在該寺掛過單，並與重宣大師有過一段交往。因此當開元寺為重宣建塔遇到困難，而可政又擁有建塔經驗時，該寺便邀請可政前往襄助。雖然此時可政已在揚州打開局面，但是他以建塔興教為重，毫不猶豫地放下一切，千里赴義。

（四）、長干寺、塔的重建

根據〈石函記〉的記載，大中祥符四年六月，長干寺地宮落成，可政等人在金陵為佛頂骨舍利入藏地宮舉辦了極為隆重的「闍郭大齋」。考古發掘出的長干寺地宮，平面為圓形，直徑2.2米，深達6.74米，是目前全國發現的最深的佛塔地宮。地宮中依次設置了石函、鐵函、七寶阿育王塔(塔函)、銀槨、金棺等多重製作精美、工藝複雜的舍利寶函。建成這樣一座地宮並完成全套寶函的製作，沒有半年以上的時間是不可想像的。這說明在蒲津建塔之後，可政根本沒有片刻的息肩。他甚至可能在蒲津建塔的同時，就已經開始了第三座塔——長干寺真身塔的籌備與建設。長干塔工開始的時間，我們推算至遲不應晚於大中祥符三年末，而長干寺的重建工程大概與塔工同時進行。

³⁴ 楊億〈塔記〉記載，重宣一生「前後登甘露法壇宣尸羅淨戒，得度者僅千餘人。」而且〈塔記〉直接稱重宣為「河中府開元寺壇長」，說明戒壇就建在開元寺內，該寺屬律宗。

長干寺、塔得以重建的機緣，〈石函記〉交待得很清楚：可政「塔就蒲津」之後，發願恢復長干寺舊日的輝煌，他通過中貴向真宗表達了這一請求，很快得到了真宗的批准，「賜崇寺、塔」。我們應該注意到，此時的可政可以經由中貴向真宗表達訴求，而數年之前在修建普惠塔時，他只能通過郡守與中央聯繫。這一變化透露出可政經過蒲津建塔一事，大大拉近了與北宋權力核心的距離，他已經獲知於真宗，與其建立了直接有效的溝通途徑。在修建普惠塔時，可政只是一名普通僧人，到了修建真身塔時，可政已經獲得了師號和賜紫的榮譽。其地位的快速提升同樣顯示出真宗對於他的賞識。可政與真宗的良好關係為長干寺、塔的順利重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可政重建長干寺的請求能夠獲得真宗的批准，有一個重要的細節值得細細體會。〈石函記〉中提到：「於先現光之地，選彼名匠，載建磚塔。」何謂「先現光之地？」，一時讓人難以理解。好在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對此有更為詳細的敘述：「(長干寺)國初營廢，鞠為榛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跡，並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為寺。政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³⁵綜合這兩條記載可以發現，可政在向真宗請求重建長干寺、塔時，是以長干寺舊址舍利多次表見感應為理由的。所謂「先現光之地」即是舍利發生感應的地點，也就是其後真身塔的所在地。「感應舍利」不同於佛陀或高僧圓寂後荼毗而得的舍利，「是因人心至誠，感得舍利應現，故名『感應』。」³⁶長干寺舊址舍利感應而生，充滿了

³⁵ 宋·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七。

³⁶ 諦如，〈道舍利〉，南京市佛教協會佛學論壇

玄妙的色彩、祥瑞的意味，更為重要的是它與大中祥符年間因天書降臨所形成的社會氛圍高度契合。可政以感應舍利投進，向真宗請求重建長干寺、塔，對於崇天書、好祥瑞的真宗而言，又如何會不同意呢？從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可政不僅善於埋首做事，更善於觀察大勢，因勢利導，最終創造並把握住了寶貴的機遇。這樣的人能夠連舉大事，絕非偶然。

可政新建的真身塔，造型為八角九層，高度為二百尺，換算成現在的公制為 62.8 米。³⁷塔工前後歷時七年，完成於天禧元年（1017 年），這是根據夏竦〈大安塔碑銘〉的記載。該銘提到：天禧元年，東京護國禪院住持尼妙善向真宗求建大安塔，「特詔許之。會江寧府長干塔成，繪圖來上，促召妙善於護國將賜之。」³⁸這段文字不僅交待了真身塔的完工日期，而且記載了真宗將塔圖賜給妙善，命其仿建，表明真宗對於可政所建的這座塔十分滿意。

在真身塔地宮中，可政保存了多份重要的舍利聖物。根據〈石函記〉的記載，地宮中共有三種舍利：佛頂真骨、感應舍利和諸聖舍利，其中佛頂真骨是整個地宮的核心。佛頂真骨以金棺、銀槨瘞藏，在銀槨底部有鑿刻的銘文：

大宋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四月八日，金陵長干寺奉真身舍利大卿施護佛頂骨。首座守正、通悟大師重航、尼寶性、比

(<http://www.njfxh.com/xfjlt.asp?newsid=392>)。

³⁷ 宋代一尺約合 31.4 釐米。參見邱光明等，《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第十七章〈宋代的度量衡〉，科學出版社 2001 年，頁 370。

³⁸ 宋·夏竦，〈大安塔碑銘〉，《文莊集》卷二十七，《四庫全書》本。

丘紹贊各奉舍利。賜紫守願、普定銀各五兩，王氏銀十兩。
(圖四)

這條銘文明確指出佛頂骨為真身舍利，來源於大卿施護。施護是北宋著名高僧、教界領袖。他本為北天竺烏填囊國人(今阿富汗境內)，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來華，獲賜紫衣。其後與天息災、法天共同主持譯經活動。雍熙二年(985年)因譯經有功，詔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³⁹這是銘文中稱其為大卿的原因。在目前掌握的史料中並沒有施護攜帶佛頂骨舍利來華的記載，但是宋初有相當一批中外僧人和使節，多次向朝廷進貢來自天竺和西域的佛舍利、貝葉梵經等物。其中進貢佛頂骨舍利的記載有：太平興國七年(982年)，「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徙囊表、佛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⁴⁰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沙門法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⁴¹至道元年(995年)，「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來朝，進佛頂舍利、貝葉梵經。」⁴²西域進獻的這些佛教聖物首先被收入宮廷，其後又會經由各種途徑陸續流出至各大寺院——尼妙善所建之大安塔，地宮中秘藏的舍利是由莊獻明肅太后所賜；⁴³一九九四年，山東省汶上縣太子靈蹤塔地

³⁹ 明·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一〈宋天息災法天施護三師傳〉，《卍新纂續藏經》冊77，頁369。

⁴⁰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大正新脩大藏經》冊49，頁398。

⁴¹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大正新脩大藏經》冊49，頁398。

⁴²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大正新脩大藏經》冊49，頁401。

⁴³ 宋·夏竦，〈大安塔碑銘〉，《文莊集》卷二十七。

宮中出土的佛牙舍利，據石匣銘文記載，出自宋英宗幼子嘉王的宮中。⁴⁴長干寺地宮供奉的這枚「佛頂真骨」，我們認為應該也是從宮中傳出，經由施護捐獻給長干寺。從這枚佛頂骨舍利的來源，我們也不難看出宋真宗在背後給予支持的跡象。地宮中珍藏的第二種舍利即為「感應舍利」，它是長干寺賴以復興的重要力量，在地宮中它們被用大銀函、鑲金小銀函、水晶瓶等另一套寶函鄭重瘞藏。(圖五)根據〈石函記〉中的記載，感應舍利本為10枚，但是經我們清點，感應舍利現為15枚說明在〈石函記〉刻成之後，感應舍利又因新的機緣有所增加。第三種「諸聖舍利」目前共發現9份，每份包含的舍利從數十枚至數千枚不等，顏色有黃、灰、紅、黑多種。(圖六)這些「諸聖舍利」很可能是高僧大德圓寂後荼毗所得。根據〈石函記〉和銀槲銘文的記載，它們是由守正、重航、紹贊、智悟、重霸、守願、妙善、寶性等僧尼所捐獻的。這些僧尼將自己珍藏的舍利供奉於長干寺地宮中，一方面是為了崇法興教，另一方面也是對可政建寺、建塔給予實際的支持，反映出可政與教界同道保持著良好的相互支持的關係。

除了僧尼之外，在建寺、建塔的過程中，可政還得到了金陵、揚州等地俗家信眾的大力支持。寺、塔建設所需資金，以及地宮中供養的珍寶很大一部分來源於此。長干寺地宮出土了一座高大精美的七寶阿育王塔，它高達1.2米，內部以檀香木做框架，外表銀質鑲金，並鑲嵌水晶、瑪瑙、青金石等各種寶石。塔身上下還滿飾各種佛教故事，精美異常——在塔座四角

⁴⁴ 汪海波，〈北宋寶相寺太子靈蹤塔地宮石匣瘞藏佛牙銘箋疏〉，見汪海波博客「海博天空」(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e5935f0100a6f0.html)。

突出的「山花蕉葉」上，浮雕了夢感白象、脅下降生、步步生蓮、雙龍灌頂、比武擲象、斷髮出家、仙人獻草、連河洗污、牧女獻糜、法輪初轉、提河示寂等十九幅佛傳故事，生動描繪了佛陀自孕育到涅槃非凡的一生；在塔座四個側面分別浮雕了「薩埵太子飼虎」、「大光明王施首」、「屍毗王救鴿命」和「須大拿王」四幅大型的本生故事。該塔是目前全國發現的體型最大、製作最精、工藝最爲複雜的阿育王塔，被公認爲「塔王」。(圖七)而鑿刻在塔座頂部的銘文說明，該塔主要是由俗家信眾集資建造的：

共計用銀一百二十二兩：曾再遇銀十兩，浦宅劉氏一娘銀九兩三分，曹延壽銀五兩，張宅劉氏一娘銀二兩，高郵軍戴承坦銀五兩半，昇州李承弟銀二兩……共用錢一百一十二貫三百七十五文足陌：會首張重旺捨錢四十一貫一百八十九文足，王文捨錢十五貫四百文足，浦承務捨錢十三貫五百三十六文足陌，張約捨錢一十一貫二百八十文足陌，徐守忠捨錢一十貫文足陌，曹延壽錢一貫文足，浦宅劉氏一娘錢七百七十文足，劉氏一娘捨錢四百文足，戴承矩一十五貫四百文足，演化母庾氏、並普仁、普輪舍錢二貫五百文足……共渡過金二兩八錢半：高郵軍戴承坦捨金二兩，會首張重旺、弟重義、男延熙、仲氏二娘、武氏九娘闔家眷屬等，捨渡塔金八錢半。徐俗捨檀香七斤同作塔身，盧承福捨水晴五十個，演化大師可政將到大聖七寶念珠並水晴珠寶，並裝在塔上，鐘承旺捨水晴……(圖八)

又如，編號「TN23-5-1」絹巾上的墨書銘文寫道：

六合縣太平坊弟子陳知厚施造長干寺三門，願承三寶恩光，永延福壽，一家眷屬，同意結緣。

在真身塔供養的物品之中，還有一卷南唐後主李煜親自書寫的金字《心經》。據王銍《默記》記載：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⁴⁵

將李煜手書金字《心經》持歸故國的「江南僧」雖然不能肯定就是可政，但是將其供奉在真身塔頂的相輪中，無疑出自塔主可政的精心安排。這一舉動透露出，可政對於南唐故國和篤信佛教的李後主始終心存感念。

經過梳理我們發現，長干寺、塔的重建得到了上至真宗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僧、俗各界信眾的鼎力支持。因而重建工程進展極爲順利——半年而地宮成，七年而寺、塔皆成。在整個重建過程中，能夠廣結善緣、集合眾力、共創大業的核心人物自是非塔主可政莫屬。

可政重建長干寺、塔，瘞藏「佛頂真骨」等舍利聖物，對

⁴⁵ 宋·王銍，《默記》卷中，頁25，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本，1981年。

於這座江南名寺有存亡續絕之功，更對中國和世界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陵長干寺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創建於三國孫吳時期，是中國南方誕生的首批寺院之一。最初它是一座建有阿育王塔的小精舍，吳末孫琳之亂中，寺、塔被毀。西晉初年，長干寺於原址重建。東晉時期，在元帝、簡文帝、孝武帝的不斷支持下，寺院逐漸壯大，寺內先後建成兩座阿育王塔，出現了雙塔並峙的繁榮局面。孝武帝寧康年間(373-375年)，劉薩訶(慧達)在長干寺內掘出佛舍利及發爪等物，轟動南北。唐代高僧道世在撰寫《法苑珠林》時，由此將「東晉金陵長干塔」列為東土十九座舍利塔之一。⁴⁶南朝梁武帝對長干寺關愛有加——大規模擴建寺院，重修兩座阿育王塔，並多次在寺內舉辦「無礙大會」，使之成為了南朝最具影響力的寺院之一。⁴⁷然而，長干寺在六朝時期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進程，不幸隨著南朝的失敗而中斷。公元五八九年隋滅陳，為了打壓金陵王氣，將建康城邑、宮殿等重要建築全部夷為平地，長干寺亦毀於兵火，成為一片廢墟。寺內兩座阿育王塔的地宮也遭遇不測，先後在隋開皇十二年(592年)和唐長慶四年(824年)被楊廣、李德裕打開，地宮內瘞藏的佛舍利和供養物品流散一空。⁴⁸

⁴⁶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經》冊53，頁584。

⁴⁷ 關於長干寺在六朝時期的歷史沿革，請參閱唐·李延壽，《南史》卷七十八〈扶南國傳〉，頁1954—1957，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資料庫」本。

⁴⁸ 分別參見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東晉金陵長干塔緣二〉，《大正新修大藏經》冊52，頁405-406；以及鎮江甘露寺鐵塔地宮出土的〈李

大中祥符年間可政重建長干寺、塔，雖然僅是初具規模，但是使得中斷了四百餘年的長干佛脈得以接續，一代名藍起死回生。天禧二年(1018年)，真宗以自己的年號為重建後的長干寺賜額，改稱為「天禧寺」，真身塔也被正式賜名為「聖感塔」。⁴⁹北宋元符、政和年間，在永公慧嚴的主持下，天禧寺陸續增建了法堂、寢堂、方丈、僧堂、廚庫等建築。經此擴建，寺內僧人「不下五六百眾」，再次成為「一大叢林矣」。⁵⁰元代，天禧寺受到多位皇帝的扶持，始終保持江南大刹的崇高地位。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親自為天禧寺挑選住持，「並撥賜故宋太師秦申王墳寺——旌忠寺為下院，以其廢產共贍講席。改賜『元興天禧慈恩旌忠教寺』額」。元文宗圖帖睦爾「以所奉觀音像付寺供養，歲給香燈之費」。至順年間(1330-1332年)聖感塔大修，文宗「即日賜白金三定及官錢伍千緡，以助修繕，台臣郡守咸致其力」，工程順利完成。⁵¹元明嬗代，天禧寺遭遇一定程度的破壞。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朱元璋命工部侍郎黃立恭主持，用三年時間大規模重修天禧寺和聖感塔。重修之後，「塔殿所在，金碧煒煌。」⁵²可惜這座新修的寺院只存在了24年，永樂六年(1408)，一場大火將天禧寺燒成

德裕重瘞長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記)(江蘇省文物工作隊鎮江分隊、鎮江市博物館，〈江蘇鎮江甘露寺鐵塔塔基發掘記〉，《考古》1961年第6期)。

⁴⁹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頁1120-1121。

⁵⁰ 宋·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七。

⁵¹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天禧寺」條，頁696-697，南京出版社《金陵全書》本，2010年。

⁵² 明·朱元璋，〈御制黃侍郎立恭完塔記〉，《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一。

一片廢墟——「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黃金之地，悉爲瓦礫」。⁵³永樂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勅工部重建梵宇，皆准大內式」，並賜新額爲「大報恩寺」。⁵⁴重建工程前後歷時 17 年，至宣德三年(1428年)方才完工。新建的大報恩寺「弘拓故址，加於舊規……殿堂廊廡輝煥一新，重造浮圖高壯堅麗，度越前代」，成爲明代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皇家寺院。⁵⁵(圖九)寺中的九級琉璃塔，高 78 米，是當時全國最高的建築物。它通體以五彩琉璃爲裝飾，美侖美奐，成爲聞名海內外的建築奇跡。

從孫吳到明清，長干寺經歷了多次的毀滅與復興，屢毀屢建，愈挫愈強。在長干寺的歷史上，可政與朱棣皆有存亡續絕之功，兩次使長干寺起死回生。但是朱棣身爲皇帝，一紙詔令即可舉全國之力；而可政只是一名普通僧人，爲完成大工所付出的艱辛不可同日而語。從這一角度來說，可政所做的貢獻更加令人欽服。更爲重要的是，可政的貢獻至今還在發揮關鍵作用——大報恩寺咸豐六年(1856年)毀於太平天國兵火，其後一直未能重建。從 2006 年開始，南京有關方面積極推進大報恩寺的重建計畫，本次考古發掘就是爲了配合此項工程而開展的。長干寺地宮「佛頂真骨」的出土，將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大報恩寺遺址的保護與重建工作上，使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關心與支持。本人相信，經可政之手保存下來的這枚佛頂骨舍利，一定能夠幫助長干寺再一次走向復興與輝煌。

⁵³ 明·朱棣，〈重修報恩寺敕〉，《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一。

⁵⁴ 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一「聚寶山報恩寺」條。

⁵⁵ 明·朱棣，〈御制大報恩寺左碑〉，《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一。

(五)、義井與白塔

重建長干寺是可政一生事業的頂點，大工完成之後他長期留在該寺。十年之後的天聖五年(1027年)，可政在長干寺的東崗建成了供奉玄奘法師頂骨舍利的白塔。此事前已涉及，不再贅述。不過在建白塔的同時，可政與丞相李迪之間又留下了一段共創義井的佳話。

李迪爲真宗和仁宗時期的重臣，兩度受命爲宰相。天聖初年，他受貶離京，一度出知江寧府(按：宋真宗天禧二年，改昇州爲江寧府)。《景定建康志》卷十九收載了一段李迪本人撰寫的〈義井記略〉：

相國隴西公赴鎮江寧，思福黎庶，志在康濟，常慮一物不得其所。有塔主大律師可政者，乃謂城之南隅，康衢四達，憧憧往來，朝及其夕，請官之隙地，特建義井，俾歷炎酷，以濟其衆。公躍聞斯美，筆允其請。遂募其積善者唐文遇，出家帑以備其事。畚鍤星聚，穿鑿聿成，固砌翠塔，廣覆華宇。冽冽其泉，縱鑠金焦石，其源靡息。輪蹄絕慮，魚樵無患，老幼承惠矣。天聖紀號五載孟春月一十有六日記。

56

根據這段記載我們得知，在李迪擔任江寧知府期間，可政向他提出建議，在城南交通要道之處由官府撥出空地，修建一座義井，以解決往來人畜飲水之需。李迪對可政的建議非常贊同，立即實施。義井由唐文遇出資，很快建成。天聖五年三月，

⁵⁶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九，頁 461。

李迪親自為義井的落成撰寫了記文。根據《景定建康志》的記載，這座義井就在「城南天禧寺側」。⁵⁷

義井與白塔的主要捐資人皆為唐文遇，根據三藏塔地宮石函銘文的記載，唐文遇與其弟文德、文慶皆為信佛弟子。我們推測，唐氏最初只是計畫資助白塔的修建，而可政看到寺外人畜面臨飲水困難，於是進一步動員他繼續出資建井。由於建井需要佔用官地，可政又向知府李迪提出申請，得到了李迪的支持。在可政的牽線下，官、民攜手，共同完成了這項善舉。

可政畢生忙於建塔、建寺，為佛教事業的發展可謂不遺餘力，但是通過創建義井這件事我們發現，他同樣熱心社會公益，關心民間疾苦，體現出慈悲為懷、心將蒼生的另外一面。

四、另一位可政——金陵蔣山可政禪師

本文研討的演化大師可政出身律宗，而且一直以律師身份示人，天聖五年李迪所撰的〈義井記略〉就直接稱譽他為「大律師」。然而檢諸禪宗燈錄，就會發現北宋時期還有一位「金陵蔣山可政禪師」。近期已有學者提出了演化大師可政「早年師從蔣山贊元禪師」的觀點。⁵⁸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對演化大師與

⁵⁷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九，南京出版社《南京稀見文獻叢刊》本，2010年，頁461。

⁵⁸ 汪海波，〈演化大師可政如何取得玄奘遺骨？〉，見汪海波博客「海博天空」(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e5935f0100xy0h.html)。該博文為博主2011年10月參加「第四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所寫論文〈演化大師可政與玄奘頂骨問題新探〉的節選。因本人尚未見到正式論文，故暫引博文。

可政禪師是否為同一人的問題進行研究，以便使一些模糊的認識得到澄清。

記載「金陵蔣山可政禪師」最重要的史料，出自北宋佛國禪師惟白在《建中靖國續燈錄》中收錄的兩條，其一說明了覺海(贊元)禪師與可政的師承關係，其二記錄了兩人之間所打的一段機鋒：

金陵蔣山覺海禪師法嗣六人：衢州石門雅禪師、信州龜峰子瓊禪師、金陵蔣山可政禪師、舒州甘露宗贛禪師、舒州甘露德儼禪師、蘇州普明道彥禪師。⁵⁹

金陵蔣山可政禪師問：如何是道？師云：不許夜行。僧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投明須到。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一人泉在最高峰。⁶⁰

另外明代僧人居頂編撰的《續傳燈錄》中也有類似的一條記載，並且將贊元的法嗣從可政等六人增補為九人。⁶¹

蔣山即是南京城東北之鐘山、紫金山。這兩條材料中提到的可政禪師，雖然與本文所述的演化大師可政宗派有別，但是兩者法名完全相同，且同在金陵為僧，他們是否為同一人？是否如某些學者認為的可政初學禪宗，後改學律宗？在現存各種燈錄中，可政禪師的事蹟並不出眾，除了與贊元的一段對答之外，找不到其他更多的訊息。但是有關其師贊元的記載卻相當

⁵⁹ 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目錄，《卍新纂續藏經》冊78，頁630。

⁶⁰ 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卷十四，《卍新纂續藏經》冊78，頁728。

⁶¹ 明·居頂，《續傳燈錄》卷十二，《大正新脩大藏經》冊51，頁545。

豐富，《建中靖國續燈錄》、《禪林僧寶傳》等宋代重要燈錄皆為贊元立傳。其中，《建中靖國續燈錄》卷七〈潭州興化禪院慈明禪師法嗣〉記載道：

金陵蔣山覺海禪師，諱贊元，婺州義烏縣傅氏子，乃傳大士之裔也。……頂角受具，冠歲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云：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慈明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悉己躬親。求道事師，少有如此。後出世蘇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志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伏。……⁶²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七〈蔣山元禪師〉的記載簡明扼要，但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傅大士之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禪師。助舂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嶽，又與俱。及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以元繼其席。……元祐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於蔣陵之東。⁶³

《禪林僧寶傳》記載了贊元的卒年——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卻未記載其生年，不過我們可以根據其他資料推算。據《宗

⁶² 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卷七，《卍新纂續藏經》冊 78，頁 681-682。

⁶³ 宋·惠洪，《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七，《卍新纂續藏經》冊 79，頁 545。

統編年》記載，贊元至潭州石霜山(今湖南瀏陽)，謁見臨濟宗第七代祖師慈明楚圓的時間為「壬申明道元年」(1032年)。⁶⁴《宗統編年》成書於清康熙年間，相隔較遠，其記載也許未必可靠。因此筆者考之《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一〈慈明禪師〉所記——慈明圓寂於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⁶⁵距離明道元年恰為十年，正是〈蔣山元禪師〉所記贊元生侍慈明「泯泯混十年」的時間。由此可證《宗統編年》的記載是可信的，贊元與慈明初見之年確為明道元年。兩人相見時，贊元年十五，由此可以推算出贊元出生於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

另外，根據《建中靖國續燈錄》的記載，贊元在石霜山前後二十年，出世之後又遊歷蘇臺、天峰、龍華、白雲等地，方才居志公道場，因此他來到金陵的時間應在明道元年的 20 多年之後；即使根據《禪林僧寶傳》的記載，贊元在石霜前後十八年，然後「兄事蔣山心禪師」，那麼他來到金陵的時間最早也是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

明確了贊元禪師的生平年代之後，再來探討演化大師可政與贊元師徒的關係就相當簡單了。據「TN23-6」羅帕題記，演化大師可政出生於南唐時期，受具足戒時仍屬南唐。按僧人受具足戒一般年二十，因此假設可政受戒於南唐最後一年，即宋太祖開寶七年(975年)，其年二十歲，那麼可政比天禧元年出生的贊元年長 62 歲，超過一個甲子還多。因此，那種認為演化大師可政「早年師從蔣山贊元禪師」的觀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且根據同樣的推算，至皇祐元年(1049年)贊元來到金陵之

⁶⁴ 清·紀蔭，《宗統編年》卷二十，《卍新纂續藏經》冊 86，頁 208。

⁶⁵ 宋·惠洪，《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一，《卍新纂續藏經》冊 79，頁 534。

時，可政已達 94 歲，很可能早已圓寂，兩人之間幾乎不存在交集。退一步說，既使可政年高壽長，仍然在世，也不可能以接近百歲的高齡轉投小其 60 餘歲的贊寧門下，改律為禪成為他的法嗣。

由此可以明確，《建中靖國續燈錄》等禪宗文獻記載的「金陵蔣山可政禪師」，與本文研究的演化大師可政肯定不是同一個人，而是同名但時代不同的兩位僧人。可政禪師應該活躍於皇佑二年之後，其時演化大師可政已然圓寂。

根據目前掌握的史料，與演化大師可政相關的情況只能探討至此。白塔建成之後，可政是否還有其他興教濟世的行動？他於何時、何地圓寂，歸葬何處，是否建塔？諸如這些問題，現在都無法回答。而且受史料所限，文中不少地方帶有推測成分，也許事實未必如此。但是正如〈石函記〉所說，「舉事諸賢，功彰不朽；陵遷谷變，此善長存」。本人堅信，演化大師可政對於中國和世界佛教發展所做的貢獻是不能被磨滅的。雖然已經相距千年，歷史的塵埃一度將他湮沒，但是三藏塔地宮、尤其是此次真身塔地宮的驚世發現，讓可政再次走近我們，面目日見清晰。可政一生所建的四座塔，目前只發現了兩處，還有兩處尚待揭密，這意味著今後我們能夠有機會獲得更為豐富的材料，能夠更加準確、深入地了解可政大師。本人衷心希望，在長干寺佛頂骨舍利聖光的照耀下，這一天早日到來。

附錄：

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

法主承天院住持圓覺大師賜紫德明述並書。

我大牟尼師，嗣賢劫第四之大寶也，總法界為化封，以教理為命令，垂衣利物四十九年。大事既周，提河示寂，碎黃金相為設利羅，育王鑄塔以緘藏耶。舍手光而分佈，總有八萬四千所，而我中夏得一十九焉。金陵長干寺塔，即第二所也。東晉出現，梁武再營。寶塔參空，群生受賜。泊平陳之日，兵火廢焉。舊基空列於榛蕪，崑級孰興於佛事。每觀藏錄，空積感傷。

聖宋之有天下，封禪禮周，汾陰祀畢，乃有講律演化大師可政，塔就蒲津，願興墜典。言告中貴，以事聞天，尋奉綸言，賜崇寺、塔。同將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共為導首。率彼眾緣，於先現光之地，選彼名匠，載建磚塔，高二百尺，八角九層，又造寺宇。□□進呈感應舍利十顆，並佛頂真骨，泊諸聖舍利。內用金棺，周以銀槨，並七寶造成阿育王塔，以鐵□□函安置。即以大中祥符四年太歲辛亥六月癸卯朔十八日庚申，備禮式，設闔郭大齋，闕於皋際，庶□名數，永鎮坤維。

上願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天基永固，聖壽遐延；太子諸王，福昌萬葉；宰輔文武，贊國忠貞；三軍兆民，樂時清泰；同緣眾信，利集無疆；舉事諸賢，功彰不朽；陵遷谷變，此善長存；地久天長，斯文永振。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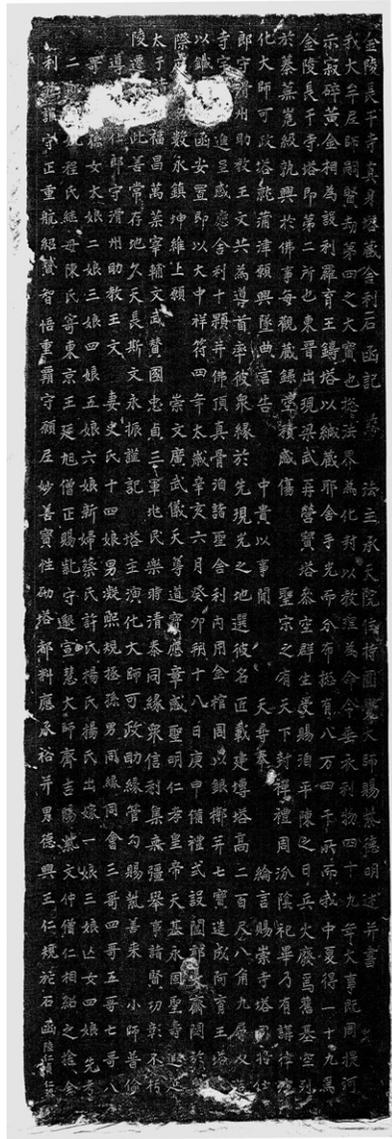
塔主演化大師可政。助緣管勾賜紫善來，小師普倫。導首將仕郎守滑州助教王文，妻史氏十四娘，男凝、熙、規、拯，

孫男同緣、同會、三哥、四哥、五哥、七哥、八哥、九哥，孫女大娘、二娘、三娘、四娘、五娘、六娘，新婦蔡氏、許氏、楊氏、楊氏，出嫁一娘、三娘、亡女四娘，先考二郎，妣程氏，繼母陳氏，寄東京王廷旭。僧正賜紫守邈，宣慧大師齊吉，賜紫文仲，僧仁相、紹之。捨舍利施護、守正、重航、紹贊、智悟、重霸、守願，尼妙善、寶性。砌塔都料應承裕並男德興，王仁規。【鉞-金+方】石函陸仁貞、仁恭。

（「□」為字跡受損，無法辨認的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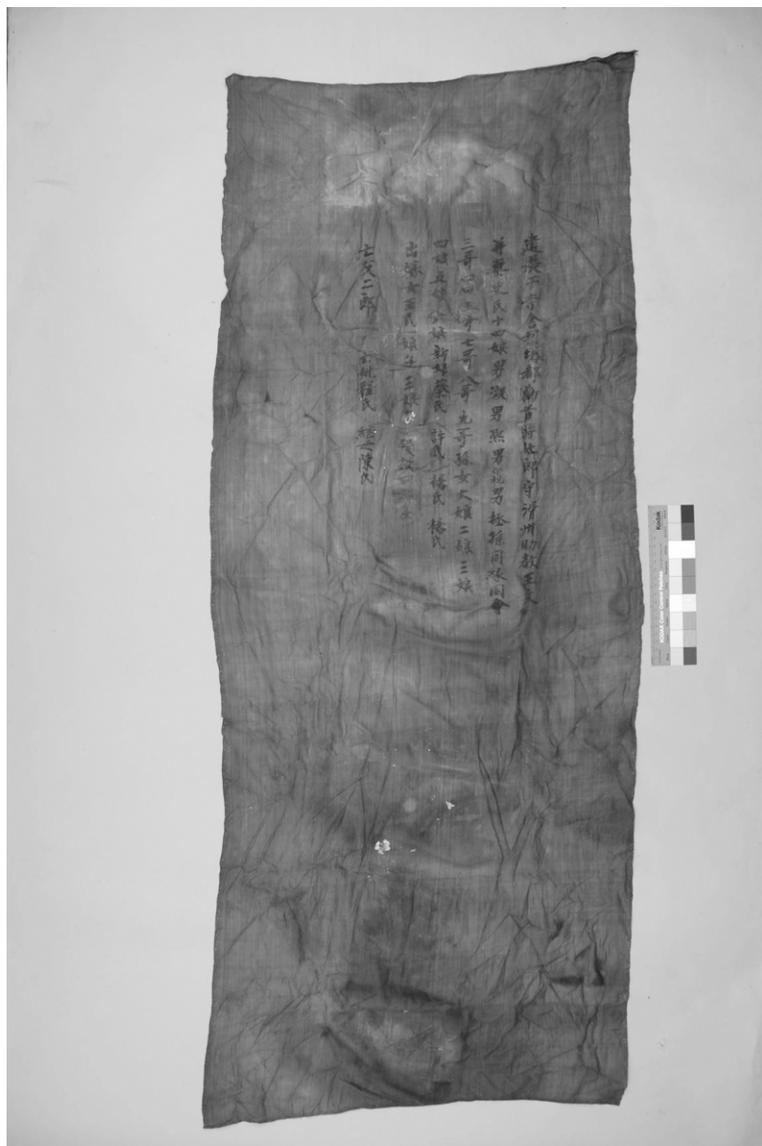
圖一，「佛頂真骨」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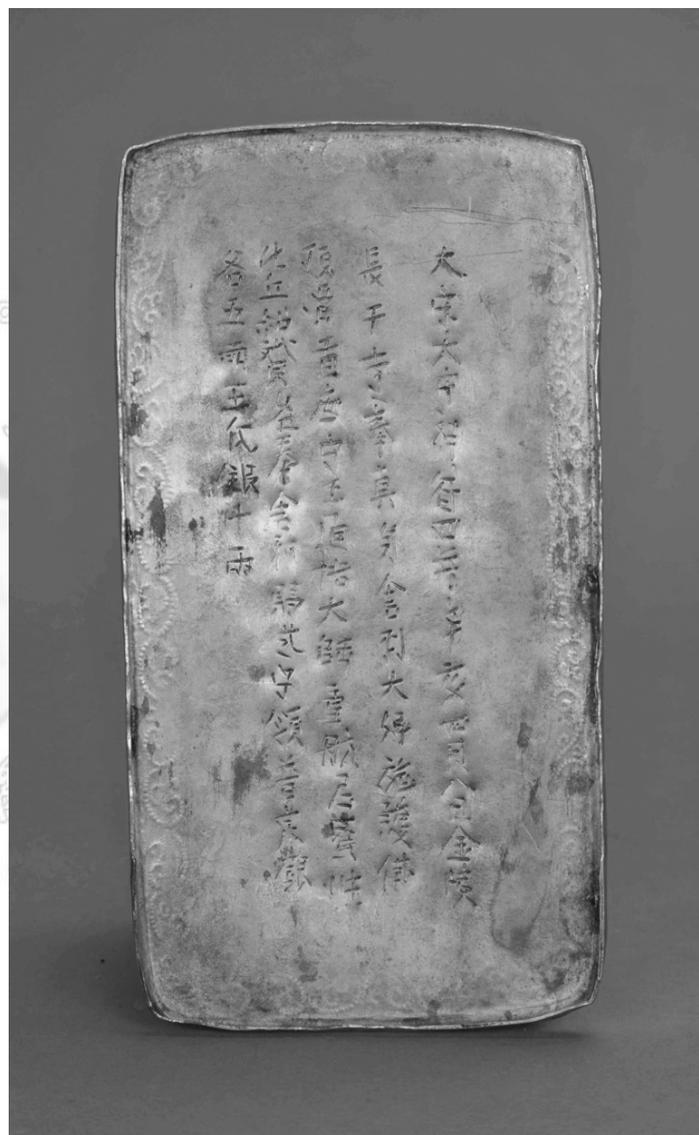
圖二、〈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石函記〉碑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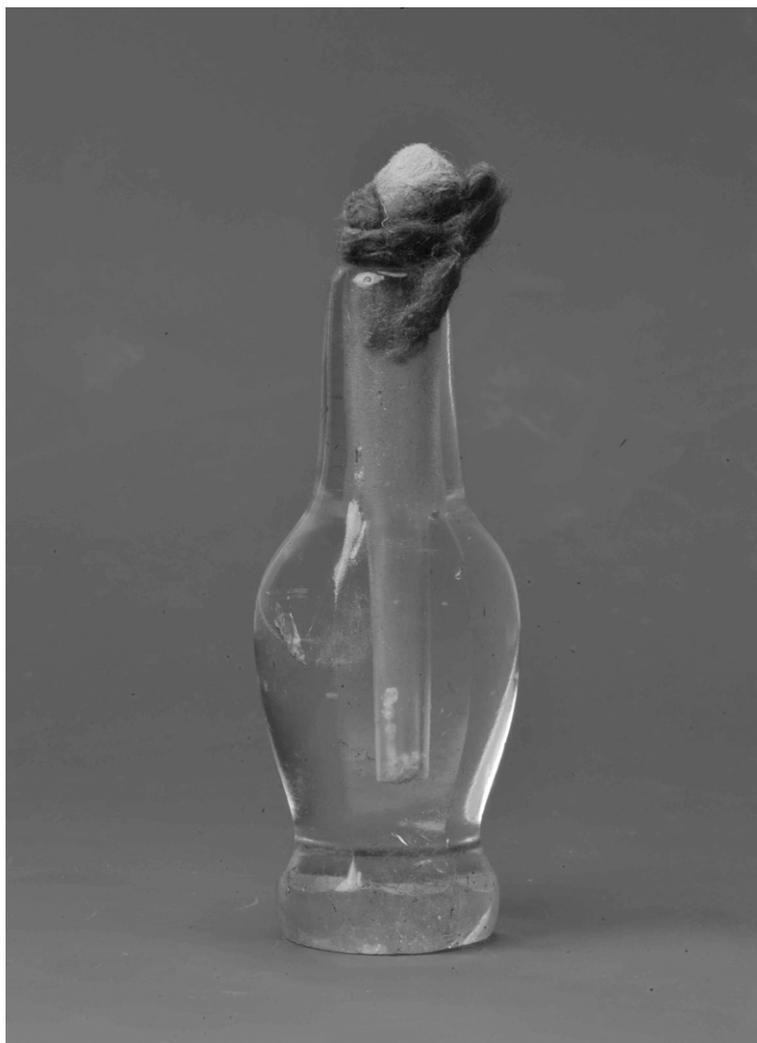
圖三、「TN23-6」可政題記



圖四，「TN23-2」王文題記



圖五，銀槲底部鑿刻銘文



圖六，水晶瓶中瘞藏的「感應舍利」



圖七，「諸聖舍利」之一，此份共 3928 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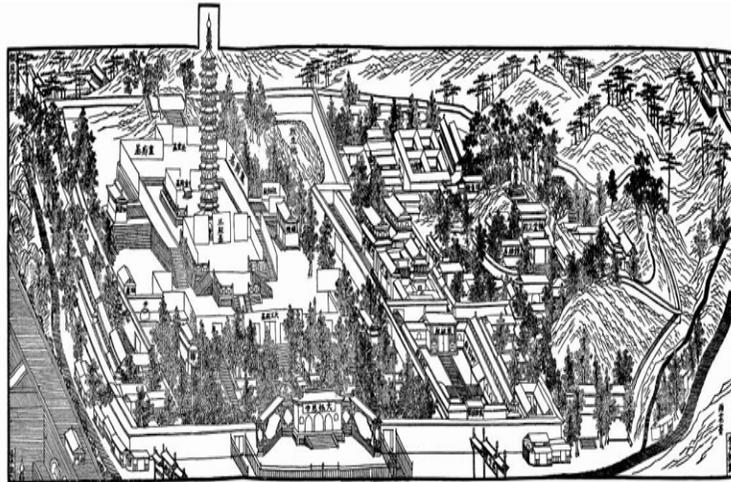


圖八，七寶阿育王塔



圖九，塔座頂部的部分鑿刻銘文





圖十，《金陵梵剎志》收錄的明代萬曆時期大報恩寺全圖

Research on Ke Zheng : A Memorable and Important Buddhist Monk of Northern-Song Dynasty

Qi Hai-Ning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the Nanjing Municipal museum

Abstract

Ke Zheng, who was also called the Yanhua Master, was a very active and important Buddhist monk during the reign of Song Zhenzong of Northern-Song dynasty. In his life time, he has managed or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pagodas; help preserve several rare Sariras such as parts of Buddha's skull and Master Xuanzang's skull etc.; rebuilt the famous Changan Temple and its tower in Nanjing which was initially built up in the 3rd Century A.D., and opened a path for the glory of the Ming dynasty Da Bao En Temple. Ke Zheng's life-work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orld Buddhist culture. However, due to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Ke Zheng has been almost forgotten by researchers during the past. Fortunately, the archaeologists found some important evidences in 2008 from a underground room beneath the Changan Temple's tower built by Ke Zheng.

Based on these newly unearthed material as well as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will gi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Ke Zheng's lif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and conducts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providing an

in-depth research on this long forgotten eminent monk from the Northern-Song dynasty.

keyword

Ke Zheng , Master Yanhua , Northern-Song Dynasty , Changgan Temple , Sarira , Song Zhenzong

